

● 丁尔纲 著

新时期文学思潮论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抚顺
封面设计 林 夕

新时期文学思潮论

丁尔纲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山东泰山古籍技术开发研究所排版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30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5043-0446-8 G·148

定价：6.80元



本书作者（1987年 济南）

对丁尔纲同志两篇论文的观点

李何林

发表在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4期上的《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评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一章》和发表在1983年7期上的《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丁尔纲同志写的既评了它的“茅盾一章”，又评了它的全书的两篇将近四万字的论文。夏著英文原书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1971年增订，中译本在香港1979年出版。英文本早在各大学风行，影响很大；中译本出版后也在我国内各大学中文系有所影响，在八十年代^{开始的}一二年我对外开放之初，有些人怕影响文化交流，对此书不敢批评；但此书对我“五〇”以来的现代小说和文学^文由于作者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立场，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流毒世界，也影响中国。在1982年的海南岛“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读了评“茅盾一章”的那篇论文，就觉得很^的好：重点批评了他由于“政治偏见”而歪曲污蔑了中国左翼和进步的文艺运动和作家；也肯定了他“艺术探索”方面的一些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夏著中有关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论争的评述，予以有理有据的辩驳，纠正了他的一

些歪曲看法。我就^在讨论会上推荐了这篇论文,觉得这篇论文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社会政治意义。

《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是进一步评论全书,比评“茅盾击掌”涉及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更多一些,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上,马列主义者和有反共立场的资产阶级学者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其影响是深远的。

这是两篇很有份量的高水平的论文。

对丁尔纲同志两篇论文的观感

——代 序

李何林

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4期上的《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评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和发表在《鲁迅研究动态》1983年7期上的《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丁尔纲同志写的既评了它的“茅盾专章”，又评了它的全书的两篇将近四万字的论文。夏著英文原本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1971年增订，中译本在香港1979年出版。英文本早在欧美各大学风行，影响很大；中译本出版后也在我国内各大学中文系有所影响，在八十年代开始的一二年我对外开放之初，有些人怕影响文化交流，对此书不敢批评；但此书对我“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和文学由于作者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立场，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流毒世界，也影响中国。在1982年的海南岛“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读了评“茅盾专章”的那篇论文，就觉得很好：重点批评了他由于“政治偏见”而歪曲污蔑了中国左翼的和进步的文艺运动和作家；也肯定了他“艺术探索”方面的一些成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夏著中有关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论争的评述，予以有理有据的辩驳，纠正了他的一些歪曲看法。我就在讨论会

上推荐了这篇论文，觉得这篇论文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社会政治意义。

《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是进一步评论全书，比评“茅盾专章”涉及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更多一些，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上，马列主义者和有反共立场的资产阶级学者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其影响是深远的。

这是两篇很有份量的高水平的论文。

前 言

(一)

新时期文学是指一九七六年十月彻底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个文学历史的新时期，实际上是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才真正开始。

新时期文学以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批判“左”倾文艺思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真正恢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五四”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文学传统，以及建国之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为基础的。从文学的复苏，到文学的发展，都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潮开路，取得了全面开拓、全面发展的辉煌成就。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矛盾运动过程。有主流，就有支流，同时也会有回流，甚至逆流。新时期文学思潮的主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入生活、贴近时代、服务人民、密切关注并真实地反映中国现实与历史、特别是“四化”建设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与此同时，其它各种革命的、进步的文学思潮也得到健康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斗争。首先是对“四人帮”的余毒——“左”倾文学思潮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时间很长，迄今仍在继续。由于“左”倾文学思潮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很久，要

肃清它，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将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历史任务。但是，正所谓“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左”的文学思潮之同时，右的文学思潮以及其它文学思潮也在潜滋暗长，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学思潮。而且，由于文艺界倾注全力反对“左”倾文学思潮，发展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潜滋暗长，很长一段时间并未给予足够的警惕。由于文艺界的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思潮的反映，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带有思想战线的全局性。

一九八一年三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①同年七月，他又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批评了“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批评了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领导的“涣散软弱的状态”。并要求以思想教育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方式予以纠正，但“不要扩围攻、搞运动。”^②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于八月召开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明确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迫切任务”。提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还指出，尽管党中央很早就敲了警钟，采取了措施进行批评教育，但“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他特别针对文艺界，

^① 《邓小平文选》334页。

^② 同上334页，345页。

在肯定“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并表示“欢迎”之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谈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谈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他认为“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他批评了“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现象，并说：“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①

但是，从八三年到八六年，情况并没有多大好转；就文学领域讲，好象愈演愈厉。一些刊物竞相为这样的作品与文章提供阵地。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却无处发表。即使发表了，也被讥为“僵化”、“保守”、“陈旧”、“左”、“打棍子”等等。甚至受到贬斥和围攻。只要回想一下去年陈涌同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22页——34页。

志发表了《文艺学方法论问题》^①一文后受到讥刺、围攻的情形，以及《红旗》杂志因发表此文而受到的带全国性的巨大压力，就可见一斑。甚至有人公然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它也是众多文艺学学派其中的一个学派，”作为历史产物“它就会有阶段性、局限性。”“它是一个具体的学科，而不是涵盖一切的哲学思维。”^②以此为借口贬低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指导作用，为各种资产阶级美学继续泛滥作辩护。

这种置中央指示于不顾，置马克思主义于不顾，继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势头，中央是了解的。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也说：“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③因此他《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中强调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④

因此，党中央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发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并作了具体部署：“这场斗争”“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

① 《红旗》1986年8期。

② 见《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号（1986年）118页，王春元同志的发言。

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2页。

④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2页，143页。

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①至此，才出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彻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好形势。这，无异是历史性的转折。从此，新时期文学将会以崭新的姿态，进入一个文学史的新时期。

笔者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目睹者，也是其理论批评的参与者。既感受到新时期文学取得成就时发自内心的喜悦，也感受到“左”的和右的文学思潮的干扰与压力。沉思之余，也有不能已于言的时候。本书就是感受到“左”的和右的思潮压力后，思想搏动而形诸笔端的部分文字的结集。这当然不是全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集；而是或针对文学思潮向右拐弯，或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学领域的某种反映，特别是针对国外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对我国当代文坛（包括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内）的冲击，所写的文章结集。因此，既不包括对当今文坛社会主义主潮的可观建树的全面肯定，也不包括对“左”倾文学思潮的全面揭露和抨击。而是以理论批评与学术探讨、学术争鸣方式，进行交流的论文结集。所以，名之为《新时期文学思潮论》，并不十分恰切。苦于找不到更简明妥贴的称谓，姑妄名之的。如果说此书尚有点可取之处，恐怕主要在于它能留下点时代痕迹。即从一个理论批评工作者在当时的时代特定氛围中，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准绳，在情势允许的条件下对文学思潮中向右拐弯的逆转现象和“左”的思潮的残余表现，有分寸地作些评析。即便如此，起码本书上编的许多文章，发表时也面临着重重阻力，而中编的第二篇文章当时则根本发表不出去。

表面看来，上编这一组文章主要是针对六十年代成书的夏志清先生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好象与新时期文学思潮没有多

^①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384页。

大关系。然而只要联系当今文坛的实际，就不会这么看问题。夏氏此书的香港版的中译本，是一九七九年七月初版的。流传到大陆，是次年及稍后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时候，特别是一九八〇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已经是秋风乍起，并在文艺界有明显的反映。而夏志清的反共的社会政治观，与其资产阶级美学观、文学史观，其影响之大，已经超过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领域，而蔓延到当代文坛，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特别是他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的过分褒扬与对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的过分贬抑，产生了直接作用；配合了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并构成了一定的因果关系。夏志清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领导作用，否定“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否定“五四”后开始萌芽，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开始形成高峰的无产阶级文学及其代表的方向。他一直否定到此书论及的截止年代即一九五七年为止，举凡无产阶级作家及其作品，均在其否定之列。同时他系统地宣扬的资产阶级美学观及其“艺术至上主义”，更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在我国文学界的反映相互汇合，是这股右的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理论批评的以至文学史的一种依据。

在当时，尽管邓小平同志的内部讲话已经部分地传达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连中央一直坚持的清除精神污染都难以认真进行，批评夏志清及其专著在中国的流毒，当然也不可能。例如一九八二年我提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在海南岛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一文，当即引起了当时健在并且出席大会的李何林先生的重视。他在大会上推荐了它，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国外资产阶级反共学者严肃论争之作。”并且呼吁有关刊物予以发表。此事引起大型综合性理论刊物《社会科学战线》与会编辑的重视，当即约我写篇全面评论夏著的文章（即本书首篇《评夏志清著〈中

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但是文章拿到编辑部就卡住了。说是“得请示省委宣传部”。请示的结果又说是“事关外交问题，还得到北京请示”。编辑部派人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门走访。答复是“学术论争，发表无碍。”但几经反复请示研究，仍然被枪毙了。理由是“事关中美关系，而且夏志清据说已经放弃了反共立场。不要因此文影响国际‘统战’工作”。尽管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负责同志答复编辑部询问时曾以本人访美时对夏氏的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据，说明夏志清并未放弃反共立场，但也未起作用。为此编辑部曾写信给我谈判“交换条件”：“不发此文，愿意发另一篇随便什么文章以作为弥补。”但我从无拿原则做交易的习惯。因此仍想为此文谋得出路：无奈只好拿到李何林先生领导的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上发表。行文及此，勾起了我当年的感慨：人家外国人明目张胆、白纸黑字地写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事过多年我们的某些党的领导同志还不敢发表从学术探讨角度作极有礼貌的反批评文章！这种在资产阶级及其掀起的反共思潮面前的涣散软弱状态，真也是达到极致了！而一生凭无产阶级的傲骨治学处世的尊敬的现代文学史界老前辈却坚决支持予以批评。遗憾的是先生在本文结集之前已溘然作古！但愿他老人家在天有灵，能从今天的现实中得到慰藉！此文的续篇《再评》也不得不拖了半年才得问世。而《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及其续篇，原是一篇文章，但因《再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部分涉及到党和鲁迅的关系以及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态度及其对党内“左”的倾向有所斗争等内容，所以此文也被腰斩；只截取谈否定鲁迅创作的部分，而砍掉了《再评》的部分。这篇《再评》直到今年四月才得以问世。由此可见，我们确实有些同志政治头脑不够清醒，更谈不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和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斗争了。

对邓小平同志批评过的现代派思潮中包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的成分，我最早有所察觉是在一九七九年后半，特别是一九八〇年。当时我认识到与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主潮相对抗的有两股潮流，一是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自由泛滥；一是封建的小市民的通俗文艺与旧戏曲的重新抬头。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爆发了一场相当尖锐的论争。我的认识和发言属于少数派。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朦胧诗，新、奇、怪，外加一个现代派。”有位地位很高的负责同志在大会报告中居然提出：“不应该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如果一定要提第一第二，我主张提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尽管此话未公开发表，但在反映文艺界当时对待这股思潮的态度方面，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

此后不仅是“朦胧诗”被当作新诗发展的方向，意识流成为小说创作的新探索、新建树，而且现代派的各种流派几乎是全面引进，并同时打出了反对现实主义的旗帜，树自己的“文坛独尊地位”的旗号。于是，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以及“表现自我”、尊重人、尊重人格等等，都被当作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厌恶政治、远离进代、淡化生活、无视人民的倾向，成为相当一部作家共同追求的文坛走向；而“主体论”几乎成为支配文艺创作的基本理论。一时间评论创作如果不运用“主体意识”或“××自我”的词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为保守、陈旧。而“全盘西化”和彻底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就脱颖而出，成为“沙龙文学”、“研究生论文模式”的理论基石。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许多一向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方向的作家更加意识到任重道远，更加奋力笔耕。其中也有的迫于思潮的压力，有的则出于趋时若鹜，而放弃了现实主义原则，滑向现代主义。极个别的不仅变本加厉，较之一开始就走上现代主义之路的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对自己的成功的过去，否定起来相当彻底，毫不顾惜！新时期十年文学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和总结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去

年连连召开的。这时的这种总结想真正把握历史规律，真正作出具有科学性的评价，自然是非常困难的。

我正是在这种情况，改变了“正面批评夏志清、旁敲侧击地评论当今文坛向右转”的方式，开始正对文坛，直接批评右向逆转的文学思潮。这个工作始于去年夏天，到今年编此论集为止。这就是本书中篇的这些文字的由来。

我略述这个发展过程，旨在提出一个问题：打倒“四人帮”并结束了个人崇拜的不正之风以后，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当今文坛以至思想战线上，尽管有象邓小平同志这样的德高望重、高瞻远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及时地敲警钟，认真地作正面引导和必要的批评教育，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仍能持续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持续得这么久；而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文章如陈涌同志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反倒或难于发表，或发表后又长期受到非难。

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问题？又是怎么形成的？无产阶级究竟怎样做，才能牢牢地占领思想领域和文艺阵地？

而且，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其几十年的曲折历史所积累的经验，认识到路线和路线斗争的重要性；那么，党领导的思想文化战线同样也以其几十年的曲折历史，特别是新时期十一年历史所积累的经验，帮助我们认识与把握了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重要意义。

真知和规律，总是通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才能把握到。而在实践过程中保持高度的自觉性，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则是既珍贵、重要，又颇不容易的！唯其如此，我们才更该努力！

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于泉城

(二)

编定这个集子并写毕前言之后，距今两年又七个月了。经过前几个月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以及最近在东欧发生的“多米诺”式变化之后，再来整理这部书稿，不禁感慨万端！

当然，今天看来，这些文字尽管够不上深刻；但总可以算作那一个阶段文坛上头脑发“热”时的清醒冷静之言罢！然而它“旅行”了好几家出版社，却难以付梓。原因是：其一，不合“时宜”。好象在中国，许多人仍习惯“定于一尊。”在所谓“先锋派”、“新潮派”兴头一时之际，说几句真话和正确的话或接近于正确的话，说早了就“不合时宜”；何况本书中相当一些文章，对一时间左右了文坛的所谓“先锋派”、“新潮派”来说，还是“逆耳”之言。其中《在当代小说拐弯处的思考——兼评现代派文艺思潮》一文发表之后，还在全国激起了一片议论。《文艺报》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在三版头条发表的宋遂良同志的题为《文学探索和探索文学》的文章中，就指名道性地给我扣上了这样的大帽子：“他对近两年来我国的文学探索和探索文学基本上作了全盘否定。”“他的批评离开了具体的作品的实际，离开了时代的大背景，离开了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用的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和文学发展实际的主观主义批评标准。”《文艺报》编辑部还为此文加了按语以示重视。尽管当时人们大都以提倡文学的“多元化”探索为时髦，但实际上有些人是只把所谓“先锋派”、“新潮派”这一“元”定为一尊，封之为“探索文学”；其它文学，包括一直是社会主义文学主流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内，在他们看来都不算是“探索文学”和“文学探索”的。何况宋遂良在文章中把《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样的在当时就受到严肃批评